



影响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巨人

——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

彭顺生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序

刘明翰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对于这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博学多才的巨人，从他逝世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历代统治者的广泛关注。这可从马基雅维里的著述在本世纪陆续出版发表以及美国著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70年代一次著名会见中曾被“指控”为“受了马基雅维里影响”得到证明。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自1925年马基雅维里的重要著作《君主论》（原译名为《霸术》）在中国面世以来，就有国内学者对他及其学说进行过探讨，近年来这种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逊于国外，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与拥有一支数量庞大、高水平的“马基雅维里学”研究队伍和数十部马氏专著的外国相比，迄今为至，国内既无一支马基雅维里研究队伍，亦无一部这位巨人的传记或有关论析其学说的专著。

值得高兴的是，彭顺生副教授潜心翻译、钻研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历经八年挖掘，终成力作《影响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巨人——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专著，填补了我国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乃至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空缺。

著者在其论著中，对马基雅维里思想所作全面系统的挖掘、整理、剖析和阐发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有关这位巨人的不少新内容的新见解：

就内容而言，长期以来国内学者限于资料，对马基雅维里的

0130206

思想研究主要限于政治思想范围之内，对其伦理思想和史学思想近年来虽有学者涉猎，但均未作深入探讨，该著不仅完善和深化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史学思想，而且还从他的新方法论入手，深入探讨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政治哲学、外交思想、军事思想、功利主义思想和廉政思想，这就大大拓宽了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的范畴，深化了马基雅维里研究的力度。

这部学术专著最可贵之处还在于有不少新观点和新论证。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从新颖的目录标题中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从宏观上看，围绕着“影响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巨人”这一中心论题，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缜密的逻辑思维，通过提出和阐明马基雅维里卓越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西方近代方法论的革新者、有名望的政治哲学家、外交家、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等一系列新观点，从而论证了马基雅维里究竟是巨人还是恶魔之迹。从微观上看，各章节新观点亦不少。如在“评价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时，作者把马基雅维里与“马基雅维里主义”区别开来，认为他的政治思想具有“进步性”、“革命性”的意义；在论及马基雅维里的外交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时，作者不仅把他视为西方“现代现实主义外交”鼻祖，而且认为他所倡导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在今日之国际外交舞台上仍然影响和制约着各国的外交政策与政治家行动。这些见解言人之未言，道人之未道，学术价值实不可低估。

总之，《影响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巨人——马基雅维里》是一部创见颇多、具有一定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它不仅将马基雅维里庞大的思想体系昭示于世，使他的思想增现光芒，为马基雅维里研究增添了新的篇章，而且它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思想承上启下的特点和对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深远影响，有助于我们完整地把握西方整个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脉络。文化巨擘们的思想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从这一角度看，作者把启蒙时代的思想巨人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对于我们吸取西方文明思想史中有益的养分，推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还要大有

裨益的。

当然，既然该书是一部具有一定开拓性意义的著作，就必然会留下进一步深化的拓展的余地，唯愿作者持之以恒，继续研讨，以期为人文学科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喜见世界史学术园地异葩初放，景色宜人，乃草序抒见是为序，兼向读者荐。

目 录

影响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巨人 ——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

导论	(1)
(一) 理论家与统治者眼中的马基雅维里	(1)
(二) 集矛盾于一身的马基雅维里	(4)
(三) 是巨人还是恶魔	(6)
第一章 向命运挑战的巨人与伟大的爱国者	(12)
(一) 坎坷的仕途生涯——从国务秘书到阶下囚	(12)
(二) “命运女神惧怕阳刚男人”——与命运抗争的巨人	(16)
(三) “我爱祖国甚于我的灵魂”——伟大的爱国者	(21)
第二章 西方近代方法论的革新者	(27)
(一) “开辟一条前人从未涉足的新路”	(27)
(二) 从实际出发	(28)
(三) 机械唯物论	(30)
(四)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31)
(五) 实证与归纳法	(32)
(六) 矛盾律与两端法	(34)
(七) 开近代政治学研究之先声	(36)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代最有名望的政治哲学家	(42)

(一)	论“命运”与“德行”	(42)
(二)	论道义与功利	(44)
(三)	论自由与法律	(45)
(四)	论国家与个人	(46)
(五)	论权力牵制与平衡	(46)
(六)	最有名望的政治哲学家	(48)
(七)	评马氏的政治哲学	(49)

第四章 独树一帜的伦理思想家

(54)

(一)	“人性恶”——马氏伦理思想的基石	(54)
(二)	对传统美德观的挑战	(57)
(三)	君主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	(59)
(四)	政治无道德论	(62)
(五)	评马氏伦理思想	(65)

第五章 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奠基者

(73)

(一)	大变革的时代——马氏政治学说形成背景	(73)
(二)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论政治的世俗性	(79)
(三)	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学说	(81)
(四)	“法律是国家的基础”——论国家与法	(83)
(五)	“共和制”较君主制更优越——论政体	(86)
(六)	“人民比君主更贤明”——论人民与君主	(92)
(七)	“恶事假手于人，善事留给自己”——论驭臣之术	(95)
(八)	论政治自由	(98)
(九)	马氏政治学说的进步性	(102)
(十)	马氏政治学说的革命性	(105)
(十一)	马氏政治学说的局限性	(108)
(十二)	马氏政治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110)

第六章 西方第一个近代军事理论家	(133)
(一) 艰难的军制改革历程	(133)
(二) 论军队	(137)
(三) 论军事建设	(142)
(四) 论战争	(146)
(五) 论战略战术	(149)
(六) 对后世的影响	(155)
第七章 西方第一个近代外交理论家	(162)
(一) 纵横捭阖的外交生涯	(162)
(二) “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近代外交原则的提出	(165)
(三) “果断”、“谨慎”、“欺诈”——论外交谋略	(168)
(四) “人们只看重军事强盛和付得起钱的人”——实力外交观	(171)
(五) “以攻为守”——扩张主义外交观	(174)
(六) 西方第一个近代外交理论家	(175)
(七) “马基雅维里时代”与“马基雅维里幽灵”	(177)
第八章 西方近代反腐倡廉的先驱	(186)
(一) 腐败的危害	(186)
(二) 腐败的根源	(187)
(三) 反腐倡廉的方法与措施	(188)
(四) 对人类反腐倡廉的贡献	(190)
第九章 洞悉社会与人心的社会心理思想家	(195)
(一) 马氏社会心理思想形成原因	(195)
(二) 人与人性——论人的社会性	(196)
(三) 善与恶——论需要与动机	(198)

(四)	德与刑——论社会控制	(202)
(五)	外圆中方——论社会态度	(204)
(六)	狮子与狐狸——论统治艺术	(205)

第十章 只求“公益”不顾“恶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

(210)

(一)	公益至上——功利主义伦理观	(210)
(二)	国家利益优先——功利主义政治观	(211)
(三)	功利主义社会改革观	(212)
(四)	评马氏功利主义思想	(213)
(五)	影响与缺陷	(216)

第十一章 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

(221)

(一)	《佛罗伦萨史》——不朽的杰作	(221)
(二)	人本史观——上帝的复归	(224)
(三)	“时代与世事在变化”——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	(226)
(四)	“命运女神”“一半归我们支配”——打破历史循环论	(228)
(五)	历史与政治结合——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230)

第十二章 马基雅维里在中国

(236)

(一)	马氏及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236)
(二)	国内学术界对马氏政治思想之研究	(238)
(三)	国内学术界对马氏其它思想之研究	(245)
(四)	马氏比较研究与马氏在中国的影响	(250)

导 论

（一）理论家与统治者眼中的马基雅维里

在人类历史的史册上，虽然不乏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没有一个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下称马氏）那样，既备受人们的褒扬和赞美，又备受人们的攻击和诅咒。

马氏于1527年走完他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旅程，从他逝世之日起，四百多年来，他一直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文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关注而又争论不休的人物。

最早对马氏发起抨击，从而挑起有关于马氏四个多世纪之争的是英国的红衣主教、著名神学家雷金纳德·波尔。1539年（马氏逝世第十二个年头）他在《雷金纳德·波尔诉之于查理五世》中断言，“马氏的《君主论》（1532年出版）是由魔鬼撒旦的手写成，其目的是为了毁掉他劝告的人”，称马氏是“罪恶的导师”，“人类的敌人”，认为“马氏毒害了英国并将毒害整个基督教世界”⁽¹⁾。波尔危言耸听的论断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不但引起了床头还置放着“《圣经》与《君主论》”的查理五世的惊讶与不安⁽²⁾，也导致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传统保守势力的恐惧与不安。他们先是沉默，将《君主论》打入“冷宫”，继而掀起了讨伐马氏的声浪。

在这股反马氏的潮流中，紧随波尔之后且反对最烈者是保守的法国道德学家。他们之所以激烈地反对马氏，除了他们的国家正在饱受意大利籍王后卡德琳娜·美第奇肆虐之苦、因而也对王后的同乡马氏甚为反感外，马氏宣称君主可以不受伦理道德束缚，主张政治与伦理道德分离，也是马氏遭到道德学家攻击的重要原

因。1576年，法国道德学家简提利特首次写出了系统抨击马氏的文章，文章不仅把马氏视为“暴政的倡导者”，是“一个用邪恶手段写政治学的人”⁽³⁾，而且还毫无理由的指责马氏是“圣巴多罗缪之夜”大屠杀的教唆者。1581年，另一名法国道德学家尼古拉·弗鲁门梭在其《财政学》中，将那些在政治行为中善弄权术者称之为“马基雅维里主义”，从此以马氏姓氏命名的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几乎成了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同义语。无论在四百年前的16世纪还是在当代现实生活中，谁要是被扣上“马基雅维里主义”这顶帽子，谁就意味着要遭到灭顶之灾；因为谁要是成了“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谁就会遭到攻击和诅咒，谁遭到攻击和诅咒，谁的政治命运也就意味着终结。被指责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后果是如此的严重，以至在当代的政治辩论中，人们都力图回避这种指责和控告，如1972年“新共和”刊载，美国著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一次著名会见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政治哲学和自己作为总统顾问的作用后，有人评论说：“听了你的评论之后，人们感兴趣的是，在什么程度上，你受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响，而不是你对美国总统有多少影响。”基辛格马上极为焦急地对这个评论加以否认。人们接着问他“是否是一个信奉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政治思想家”，他回答说：“不，完全不是”。最后有人问，“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否受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响”，他的回答是：“一点也没有”⁽⁴⁾。

然而，上述评判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它无视马氏对欧洲社会影响深远这一客观事实，曲解了马氏学说的真谛。正因为如此，从17世纪开始，随着马氏的主要著作逐渐为人们了解，人们对他的评价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一大批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他的肯定评价上。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从归纳的、实验的和实用的新哲学原理出发极力赞赏马氏那种观察现实的敏锐的洞察力。他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指出：“我们十分感谢马基雅维里及其他一类的作家，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和描述人们怎样做，而不是人们应该怎样做”⁽⁵⁾。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一批英国资产

阶级政治思想家如詹姆士·哈林顿等，他们视马氏为共和主义的倡导者，称他为“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和杰出的人民利益维护者”。到了19世纪，随着意大利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提到议事日程，马氏被德、意两国民族主义政治学家认定为：“爱国主义者”、“共和政府和民族独立的促进者”，著名史学家布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进一步予以肯定，认为他“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⁶⁾。到了19世纪把马氏研究推向最高潮的维拉里则高度评价马氏为“超过同时代人的天才”⁽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不赞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权术，但对马氏是持肯定态度的。马克思除了认为马氏政治学揭开了近代政治思想史新的一页外，还在其著作中认定他“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同时又是值得一提的军事著作家”，恩格斯甚至称赞他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⁸⁾。当历史步入二十世纪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依然很高。他常常被冠以“第一个现代政治哲学家、政治现实主义者，权力理论家，自由主义的创立者和民族主义之父”等头衔⁽⁹⁾。

当然，在不少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肯定并高度评价他的同时，仍有不少人对他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他们是一批君主专制的反对者，他们要求按照理性和道德进行统治，因而他们对主张政治无道德的马氏，在评价时显得有些保留。他们一方面指责马氏是不讲道德的政治家，是“暴政”的倡导者，另一方面又在论及马氏的文章中，认为马氏写《君主论》的目的是描述君主专制的恐怖，误解主要是读者的错误，他们将“讽刺当作了颂扬”⁽¹⁰⁾。进入20世纪以后，围绕着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谴责者在从道德上抨击马氏的同时，还重弹16世纪神学家和道德学家的老调，称他为“罪恶之师”、“堕落的天使”、“非道德主义者”、“专制主义的辩护人”和“政治学恶魔”⁽¹¹⁾。

如果说在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等诸如此类的理论家眼中，马氏是一个复杂而又具有多重性质的历史人物，那么在统治者眼中，

马氏的形象则比理论家眼中的马氏形象简单得多。在他们看来，无论学术界如何评价马氏，但客观事实是，他的政治学说无疑是巩固统治、治理国家的一剂“良方”，在治愈分裂、消除腐败、驾驭臣民、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功效。正如拜萨因在论及马氏专制理论的作用时指出：“专制制度的强制力量是一付强烈的政治药剂，对腐败的国家和所有国家遇到特殊紧急情况时，这付药是有用的”⁽¹²⁾。因此，尽管绝大多数统治者和政治家因害怕被人指控为“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而从不承认自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但实际上，不少统治者和政治家不仅信奉马氏的学说，把他的学说视为“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而且在政治实践中都遵循他的学说、运用他的学说。据统计：与马氏同时代的英王查尔斯五世、亨利八世、伊利莎白女皇、法王亨利三世、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7世纪的法王亨利四世、首相黎塞留、路易十四，18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六、普鲁士大公腓特烈，19世纪的拿破仑，俾斯麦、20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罗斯福等⁽¹³⁾，所有这些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扮演过有声有色角色的风云人物，无一不把《君主论》置于案头，无一不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政治实践中运用过他的政治理论，实践过他的政治哲学。

从上可知，马氏的确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而长期争论不休的结果，势必在他的名下汇集一个又一个历史之谜，诸如他究竟是道德主义者还是非道德主义者，是共和制的倡导者还是专制主义的辩护人，是爱国主义者还是毁灭国家的敌人，是巨人还是恶魔等等。面对如此众多而复杂的历史之谜，以至于享誉欧洲的学者克罗齐都这样叹道：“马基雅维里之谜也许永远无法解决”⁽¹⁴⁾。“马基雅维里之谜”的确存在，但并非永远无法解决。要想破解马氏之谜，关键在于要弄清造成马氏之谜的主要原因。

（二）集矛盾于一身的马基雅维里

人们之所以在评价马氏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的名下

之所以会汇集诸多的历史之谜，除了评价者看问题的角度、运用的方法不同以及时代和阶级局限等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影响外，马氏本身作为“矛盾”式的人物，则是造成上述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马氏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在这个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里，新旧事物、新旧阶级、新旧思想并存，由此造成了马氏复杂的精神世界、多重的政治性格以及交织着矛盾的一生。

马氏作为集矛盾于一身的历史人物，首先体现在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一生仕途坎坷，却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少数几个博学多才的巨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者，但却完全漠视与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理论家“用以表达思想的概念和范畴”，诘难、甚至批评否定与现实不相符合的传统的人文主义观点^{〔15〕}；他撰有为君主提供治国方略的《君主论》，却又写下了讴歌共和制度的《罗马史论》；他是共和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又“献媚”于实现独裁统治的美第奇家族；他满腔热情地描绘祖国统一的蓝图，却对祖国统一的前途深感失望；他有心报国，却报国无门；他博学多才，却空有一身才华，被政敌和当权者拒之于政坛之外，最终忧伤而死。

马氏作为集矛盾于一身的历史人物，其次体现在他的不少思想观念和主张处于自相矛盾之中。他贬低和取消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价值，却又称颂善的品行；他提倡欺骗暴力，却要君主尽可能的守信和仁慈；他对谨慎从事的品行给予赞扬，却又掩盖不了他对冒险精神的赞美；他具有浓厚的政治自由思想，却又力主君主政治；他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混合型政府”作为心目中的理想政府，却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具有完全与绝对的某种最高权力”的“君主专制政府”；他形而上学地看待人性，却对世事的发展深信不疑；他相信命运的力量，却又把命运看作是可以征服和驾驭的驯服的女神；他对教皇和基督教不屑一顾，却又承认宗教有调节社会的作用和功能。

可见，马氏的确是一个笼罩在矛盾之中的历史人物，正因为如此，世人对他的评价才充满了矛盾：如前所述，他既有“近代政治学之父”等多项桂冠，又有“邪恶的导师”等众多恶名；他曾被革命导师颂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也曾被人诅咒为“恶魔”，那么，马氏究竟是“巨人”还是“恶魔”？这是本书导论所要阐明而且必须要阐明的第三个问题。

（三）是巨人还是恶魔

马氏究竟是“巨人”还是“恶魔”，这是“马基雅维里诸谜”中最大的谜，解决了此谜，也许其它谜就迎刃而解了。

“恶魔”一词与“魔鬼”、“魔王”、“撒旦”同义，西方世界魔鬼（old Nick）一词就来自马氏姓名的头一个字。最早把马氏与恶魔联系起来的是第一个向马氏发起攻击的英国神学家波尔。他认为《君主论》是由魔鬼撒旦之手写成。尔后反“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在政治学领域诅咒马氏时广泛地使用了这个词。在政治学领域，人们称他为“政治学恶魔”，含义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从他鼓吹政治无道德的角度，谴责他为反道德的恶魔，有的从他反宗教神学的角度诅咒他为撒旦，而有人却从他倡导专制统治的角度，称他为“政治学恶魔”，还有人则从他主张武力、欺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角度，把他视为与魔鬼意思相近的“邪恶的导师”。关于马氏被视为魔鬼一事，后人曾有过评论，“大多数马基雅维里的早期的读者，对他的观点感到极为震惊，因而横加指责，甚至视他为魔鬼的创造物，或者甚至是魔鬼本人”^{〔16〕}。

然而，无论人们从何种角度诅咒他为“恶魔”，客观事实是，他绝不是恶魔，而是适应时代需要产生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影响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多才多艺的巨人。

欧洲在资本主义萌芽前，曾经历过所谓黑暗的“冬眠”时期，在这个宗教神学一统天下的时代里，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哲学等各部门学科成了神学的婢女，宗教成了人们生活的核心内容，社

会是一派死寂般的阴沉。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直到14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封建社会这个孱弱的母体内躁动才得以改观。随着资本主义在意大利萌芽后迅速成长壮大，崛起的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旧的社会藩篱，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人的生存困境亟需突破，为此需要一大批充满自信与活力、敢于与旧世界挑战的巨人，以创造一个适于人、尤其是适于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于是，从14世纪开始，欧洲进入了一个被恩格斯称之为“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¹⁷⁾马氏不仅是一大批巨人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文艺复兴时代思想领域唯一能与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艺术大师达芬奇、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媲美的巨人。

马氏作为巨人首先体现在他是政治思想巨人。这不仅仅因为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少数几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代表时，曾把他列为四个巨人代表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初步建立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西方近代政治学。马氏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发展之需要，通过把新的“科学方法论”引入政治学领域，凭借敏锐的政治头脑、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缜密观察，围绕着重意大利如何统一、如何巩固君主的地位，在其《君主论》和《罗马史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理论，从而构建起以世俗政治学说、国家权力学说和政治权术为主干的政治思想大厦。马氏政治思想形成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力量，服务于意大利统一的爱国目的，服务于世俗民族国家，同样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超出了一个阶级的狭隘范围，“成了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格拉姆什写道：“马基雅维里是一位真正的时代人物，这个时代的特点趋向于建立民族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建立使资本主义生产有可能顺利发展的形式”⁽¹⁸⁾。马氏政治思想还以世俗化和独放异彩为特征，上承西方古典政治学，下启西方近代政治学，彻底摧毁了束缚政治的神学和道德两道坚固藩篱，埋葬了整个中世纪的理论

遗风，从根本上促进了古典政治学向近代政治学的转变，从而“引发了现代第一次浪潮的政治革命”⁽¹⁹⁾。正是基于马氏在政治思想领域所作的巨大贡献，恩格斯才称颂他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

其次体现在他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马氏少时曾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这为他成为博学多才的巨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余年仕途生涯——掌管外交和军事事务，为其外交理论和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八年罢官闲居，使其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和探讨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各种有价值的学问。晚年奉命撰史，客观上为其研讨历史提供了方便。正是基于上述良好的主客观条件，马氏才得以成为多才多艺的巨人：他不仅是奠定西方近代政治学基础的政治思想家，而且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望的政治哲学家；不仅是西方近代第一个外交理论家，而且是西方近代第一个军事理论家；不仅是独树一帜的伦理思想家，而且是洞悉社会与人心的社会心理思想家；不仅是功利主义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此外，他还是值得一提的戏剧家与诗人。

最后体现在他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上。是巨人就势必会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正如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巨人深深的影响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形成和发展一样，马氏作为资产阶级巨人也深深地影响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形成和发展。在研究方法上，马氏开创的从事实和经验出发研究政治的新风尚，直接影响到17、18世纪思想家，“一些18世纪的思想家是在马基雅维里的探讨政治学的方法中认识到真理的”；在政治思想领域，他的许多政治主张为后世不少资产阶级政治家所继承和发扬——“霍布士、洛克、休谟、孟德斯鸠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学徒”；他的政治权术理论不仅为统治者在国内政治事务中所采纳，而且还为外交家在外交活动中所运用，“欧洲的君主和外交官亦多采用了马氏的权术论的政治理论，作翻云覆雨、幻变诡诈的政治外交运用”⁽²⁰⁾；甚至就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因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他的“暴力学说”等，而被人称为“无产者的马基雅维里”。在军事学领域，

他的“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对抗侵略的灵活多变战术论以及以“战争制止战争”的战争观，也对后世的军事理论家，如若米尼、拿破仑等，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外交思想领域，有人认为，“他那国家扩张的理论与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造成欧洲强国对外攫取殖民地的野心及惨烈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21〕}；而他首倡的外交原则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外交观，无论在近现代外交舞台上还是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我们仍然可以听见所谓“外交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遥远的历史回音。在历史学领域，他从人本史观出发，打破了前人按先定模式和规定来写历史的传统，使史学从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视经验和现实，倡导史学为政治服务，把历史视为前后相连、因果攸关的过程，成为十九世纪历史主义史学的滥觞。至于他的功利主义理想，不仅影响了西方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而且还对造成西方功利主义的社会风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氏思想对后世影响如此之大，无怪乎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欧洲近三百年来思想形成和发展，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位伟大人物之一，有人把他的《君主论》视为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名著，更有人把他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影响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认为“在卡尔·马克思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对人类政治思想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

总之，马氏是在大地上真正刻上了自己名字的多才多艺的巨人。作为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他留下了《君主论》与《罗马史论》至今仍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精品；作为外交家，他留下了蕴含着丰富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驻外公使论集》；作为军事著作家和军事理论家，他留下了第一部对西方近代军事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的艺术》；作为历史学家，他留下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称之为杰作的《佛罗伦萨史》；作为戏剧家，他创作了在当时颇负盛名且演出相当成功的剧本《曼陀罗华》；作为诗人，他留下了风格清新算得上当时诗歌佳品的《金驴》诗。普利佐礼尼曾对他综合评论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位教士，但却是教會的敌人。马基雅维里是一位爱国者，是念念不忘意大利统一的